

梁归智



Hongloumeng Tanyi

《红楼梦》以一个残缺的文本，尚成就中国文学不可企及的高峰。
多少人为之喟叹，为之想象全璧的完美。

红楼梦

探佚



「探佚学三十年纪念珍藏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梁归智



《红楼梦》以一个残缺的文本，尚成就中国文学不可企及的高峰，
多少人为之喟叹，为之想象全璧的完美。

Hongloumeng Tanyi

红楼梦

探佚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红楼梦探佚 / 梁归智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303-10907-4

I. ①红… II. ①梁…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3470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 mm × 240 mm
印 张: 32.75
字 数: 524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策划编辑: 马佩林 责任编辑: 马佩林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毛 佳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李 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红楼梦探佚》序

拙著《石头记探佚》1983年初版时，周汝昌先生和姚莫中先生曾分别赐《序言》和《前言》。姚先生在《前言》中说：“为什么书名不用《红楼梦》而用《石头记》呢？他的意见是：因为《石头记》是《红楼梦》的原名、初名，用这一书名，就带有追求原著本来面貌的倾向；而所谓‘探佚’的‘佚’，是指原有而丢失了的部分，虽丢失了，但仍有若干蛛丝马迹，可资探索，所以要探。因为要了解曹雪芹，就必须读他的原著；要读他的原著，就必须剥去后人篡改了的部分，再考补已佚失了的部分，才有可能。‘探佚’的意义，就在于此。”这是对“探佚”最简明扼要的概括。弹指一挥间，已经进入21世纪20年代，红学探佚的意义早已大行于天下，《石头记》和《红楼梦》的版本情况也已经人所共知，因此，为了更醒目、更大众化，这次第四版的《石头记探佚》改名为《红楼梦探佚》。

周汝昌先生当年所赐《序言》中则有云：“红学最大的精华部分将是探佚学。”又谬奖拙著的写成：“这是一件大事情，值得大书特书。在红学史上会发生深远影响。”

1990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大辞典》中有《石头记探佚》辞条，说此书的出版“兴起了一个红学分支——‘探佚学’”。

从拙稿开始写作的1980年算起，迄今为止，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探佚学从初出茅庐到走向辉煌，证明姚先生、周先生和《红楼梦大辞典》的高瞻远瞩，良非虚语。30年来，红学界的探佚研究，论文发表了近百篇，专著出版了十几种。而1987年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八十回以后的情节改编，取了探佚思路，实际上是探佚成果的艺术再现。央视“百家讲坛”2004年推出系列节目“红楼六家谈”，其中有我的两讲《红楼梦的断臂之美》和《曹雪芹的超前之思》，也就是“红楼梦探佚”，后来出了光碟，从此成为全国许多教育单位经常使用的电化教材。2005年“百家讲坛”又推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更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成为当年的一个文化事件。其实在相当程度

上，刘先生的演讲系列是探佚学各家成果某种集大成式的综合——当然刘先生做了不少推演改造，打上了强烈的刘心武印记。总之，尽管对探佚的具体观点尚存争议，对探佚有赞成也有反对，但探佚学的风靡于世有目共睹。我曾开玩笑说：“试看今日之红学，岂非探佚之天下？”

明白了上述的背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石头记探佚》的最新版《红楼梦探佚》，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一版在2005年山西古籍版的基础上，又有所润色，主要是在“考论编”中增加了《应是“绿肥红瘦”》一篇，在“思理编”中增加了《误解与知音——“两个世界”与探佚学》一篇。此外改正了旧版中某些排印失误和遗漏，个别字句有所增删，同时对附录中《版本情况简介》和《探佚论文、专著篇目辑要》作了与时俱进的补充。1981年所写《自序》中，《题〈石头记探佚〉》七律末句“大荒山下看双星”改为“大荒山下望双星”，因为“看”在古代诗词音韵中一般算平声字，“看双星”就成了“三平调”，于音律有所欠缺。

应该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马佩林先生，由于他的热情鼓励和积极策划，才使这个《石头记探佚》的最新版《红楼梦探佚》得以顺利问世。

诗曰：

卅载红楼探佚昌，论坛影视竞芬芳。

煌煌四版非虚誉，新月依稀旧海棠。

2009年12月18日于大连佚人居

《石头记探佚》序/周汝昌

此刻正是六月中伏，今年北京酷热异常，据说吴牛喘月，我非吴牛，可真觉得月亮也不给人以清虚广寒之意了。这时候让我做什么，当然叫苦连天。然而不知怎么的，要给《石头记探佚》写篇序文，却捉笔欣然，乐于从事。

研究《红楼梦》而不去“打开书”，研究作品的“本身”，却搞什么并不“存在”的“探佚”！这有何道理可言？价值安在？有人，我猜想，就会这样质难的。舍本逐末，节外生枝，还有什么词句名堂，也会加上来。

《探佚》的作者，曾否遭到不以为然的批评讽刺，我不得而知。假如有之，我倒愿意替他说几句话。——以下是我假想的答辩辞。

要问探佚的道理何在，请循其本，当先问红学的意义何在。

“红学”是什么？它并不是用一般小说学去研究一般小说的一般学问，一点也不是。它是以《红楼梦》这部特殊小说为具体对象而具体分析它的具体情况、解答具体问题的特殊学问。如果以为可以把红学与一般小说学等同混淆起来，那只说明自己没有把事情弄清楚。

红学因何产生？只因《红楼梦》这部空前未有的小说，其作者、背景、文字、思想、一切，无不遭到了罕闻的奇冤，其真相原貌蒙受了莫大的篡乱，读者受到了彻底的欺蔽。红学的产生和任务，就是来破除假象，显示真形。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扫荡烟埃”“斥伪返本”。不了解此一层要义，自然不会懂得红学的重要性，不能体会这种工作的艰巨性。

在红学上，研究曹雪芹的身世，是为了表出真正的作者、时代、背景；研究《石头记》版本，是为了恢复作品的文字，或者说“文本”；而研究八十回以后的情节，则是为了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基本轮廓和脉络。而研究脂砚斋，对三方面都有极大的必要性。

在关键意义上讲，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连一般性的考释注解《红楼》书中的语言、器用、风习、制度等等的这支学问，都未必敢说能与上

四大支并驾齐驱。

如果允许在序文中讲到序者己身的话，那我不妨一提：我个人的红学工作历程，已有四十年的光景，四大支工作都做，自己的估量，四者中最难最重要的还是探佚这一大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例：当拙著《新证》出增订版时，第一部奉与杨霁云先生请正，他是鲁迅先生当年研究小说时为之提供《红楼》资料的老专家，读了增订本后说：“你对‘史事稽年’一章自然贡献很大，但我最感兴趣的部分却是你推考八十回后的那些文章。”这是可以给人作深长思的，——不是说我做得如何，而是说这种工作在有识者看来才是最有创造性、最有深刻意义的工作。

没有探佚，我们将永远被程高伪续所锢蔽而不自知，还以为他们干得好，做得对，有功，也不错……云云。没有探佚，我们将永远看不到曹雪芹这个伟大的头脑和心灵毕竟是什么样的，是被歪曲到何等不堪的地步的！这种奇冤是多么令人义愤填膺，痛心疾首！

红学，在世界上已经公认为是一门足以和甲骨学、敦煌学鼎立的“显学”；它还将发扬光大。但我敢说，红学（不是一般小说学）最大的精华部分将是探佚学。对此，我深信不疑。

我平时与青年“红友”们说得最多的恐怕要算探佚。不识面的通讯友，遍于天下，他们有的专门写信谆谆告语：“您得把八十回后的工作完成，否则您数十年的工作就等于白做了！”他们的这种有力的语言心意，说明他们对此事的感受是多强烈，他们多么有见识，岂能不为之深深感动？通讯友中也有专门的探佚人才，他们各有极好的见解。最近时期又“认识”（还是通讯）了梁归智同志。当时他是山西大学中文系研究班上的卓异之才，他把探佚的成果给我看，使我十分高兴。他是数十年来我所得知的第一个专门集中而系统地做探佚工作的青年学人，而且成绩斐然。

我认为，这是一件大事情，值得大书特书。在红学史上会发生深远影响。我从心里为此而喜悦。

这篇序文的目的是不由“我”来“评议”《探佚》的具体成果的是非正误，得失利害，等等。只有至狂至妄之人才拿自以为是的成见作“砝码”去秤量人家的见解，凡与己见合的就“对了”，不合的都是要骂的，而且天下的最正确的红学见解都是他一个提出来的。曹雪芹生前已经那样不幸，我们怎忍让他死后还看到红学被坏学风搅扰，以增加他那命运乖舛之奇致呢？《探佚》的作者学风文风，非常醇正，这本身也就是学者的一种素养和表现。他的推考方法是正派路子，探佚不是猜谜，不是专门在个别字句上穿凿附会，孤立地作些

“解释”，以之作为“根据”。他做的不是这种形而上学的东西。他又能在继承已有的研究成果上，知所取舍，有所发明，有所前进。他的个别论述，有时似略感过于简短，还应加细，以取信取服于读者，但其佳处是要言不烦，简而得要，废文赘句，空套浮辞，不入笔端。

为学贵有识。梁归智同志的许多优长之处的根本是有识。有识，他才能认定这个题目而全面研讨。

这是他着手红学的第一个成绩。在他看来，必不以此自满，今后定会有更多的更大的贡献。这也是我的私颂。

这篇短序，挥汗走笔，一气呵成，略无停顿。虽不能佳，也只好以之塞责了，它只是替《探佚》说明：这不是什么“本”上之“末”，“节”外之“枝”，正是根干。

一九八一年七月廿四日

辛酉中伏

写在《石头记探佚》的前边/姚奠中

我不喜欢《红楼梦》，尽管它是中国文学以至世界文学名著。原因是和巴金同志的《家》、《春》、《秋》一样，老是那些家庭琐屑……读下去总觉得有点气闷。当然如果随手抽出几段，看一看人物的语言、行动，那我又不能不赞叹它描写得细致、形象、生动了。这种个人偏见，是不需要争论的，何况我讲文学史要讲它，专题也讲过它，而讲它的时候，并不抱成见，仍尽量评价它的思想性、艺术性呢！因为这里涉及一个如何对待学术问题的问题，不能凭感情用事。

对学术，有些人喜欢固执己见，对别人则党同伐异：同意我的就赞扬，不同意我的就贬低；在学校，有的教师考试时必须按他讲的答，不然，再好也不给及格，也属于这一类。有些人喜欢矜奇立异，要惊人，哗众取宠：远一点的，像说屈原没有其人；近一点的，像说《红楼梦》不是曹雪芹作之类，越怪越好。还有些人喜欢钻牛角，穿凿附会，连篇累牍，甘作秦近君的徒弟。如此等等，虽不是政治问题，可以自由地去讲，但作为学术，作为科学研究，我却认为那是不值得赞扬的。

我以为学术、科研，总是要有目的要求的。否则，不是愚蠢便是欺骗。在总的目的要求下，才可以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如果把目的要求机械化，变成框框，成了清规戒律，或以某些新旧教条为依据，不许自由思想、自由探索，那“双百”方针，也就变成了空话，学术、科研也就谈不上发展和前进了。所以，我们必须有个好的学风。那就是在明确的、共同的总目标下，充分发挥每一个从事科研者的主观努力，充分利用每一个问题上可能得到的客观资料和条件，做出自己的、新的、有益的贡献。我是这样看待一切学术、科研问题的，也是这样指导研究生的。在这里，绝不个人的爱憎、偏见所左右。

我的研究生梁归智，在作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写成了15万字的《石头记探佚》，用其中的三篇，参加了论文答辩。为什么书名不用《红楼梦》而用《石头记》呢？他的意见是：因为《石头记》是《红楼梦》的原名、初名，用这一书名，就带有追求原著本来面貌的倾向；而所谓“探佚”的“佚”，是指原有而丢

失了的部分，虽丢失了，但仍有若干蛛丝马迹，可资探索，所以要探。因为要了解曹雪芹，就必须读他的原著；要读他的原著，就必须剥去后人篡改了的部分，再考补已佚失了的部分，才有可能。“探佚”的意义，就在于此。

近年来，“红学”可以说是红极一时，“红学”论著，空前繁富。我只读了一小部分（有些是搞红学的朋友直接寄给我的）和一些目录，已感到目不暇接。我凭自己的浅见，把这些文章戏分为“红内学”和“红外学”。外学嘛，我不感兴趣，至于内学，有好文章，但我以为至今还挖掘得不够。梁生的《探佚》，是属于内学的。他是要探索原书的创作思想、艺术构思，进而发掘作者曹雪芹的内心世界的。《探佚》只是第一步。单就“内”“外”来谈，可以说是内之内。他所用的论据：一是原著未佚部分中的伏笔、隐喻、暗示和文章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和作者有相当关系的亲属、朋友以脂砚斋为代表的基本上是在作者写书过程中所作的一些批注评语——即所谓“脂批”。从今天看，两者都是第一手资料。但是这一工作，却仍十分困难。因为伏笔、隐喻之属，需要猜，猜，就难保证十分准确；而脂批既零碎，又有相互矛盾之处，要分析、辨别，才能用来印证。这就决定“探佚”工作，必须目光敏锐，必须细心、深入，必须思虑周密，必须善于论证。梁生的《探佚》，是具备这些特点的，故能成绩斐然，不同凡响。有不少地方，可以使读者感到豁然冰释、怡然理顺，既新鲜而又自然。但由于资料有限，而明确的资料更少，这就使得有些结论，猜测推论占了很大比重，不能使人满足。在这里，其意义便只限于提出问题，做出可能的涉想，给人启发，为进一步钻研打基础了。

在《红楼梦》的原本《石头记》的本来面目没有弄清之前，探佚工作就不可能终止。梁生的努力，虽是在前辈专家研究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但如果据此就要全面评价曹雪芹和他的《石头记》，那就还嫌太早。梁生在他的《探佚》最后一部分，“浅探”“蠡测”了《石头记》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自然也不能作为结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这部分中所提到的东西和他的分析、评论，和一般就程高本《红楼梦》所作的评论比，确已大为改观。可见他的工作，对“红学”研究已起着何等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就使我这素不喜欢《红楼梦》的人，也不能不予以热情的支持。

梁生的这廿几篇《探佚》论文，有些已发表或即将发表，其论点、论据、论证，估计在社会上会有不同的反应。但我以为他做的是有意义的工作，而且做出了成绩。不管怎样，都是可喜的。即使引起新的争论，那对学术来说，不是更好吗？因为它将推动“红学”的发展、前进。

1981年8月10日

自序

在历史上竟会有这样没有天理的事发生，出现了一位卓绝的文学天才，他以全部的生命和心血创造了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不，是建立了一座辉煌的艺术殿堂，半空中却忽然打下来一柄重锤，把这件珍品、这座殿堂最珍贵的部分砸碎了。然后来了一个不是天才但也有点才能的匠人，遵照执锤者的意旨对残壁进行了改造和修补，于是这件真假合一的玩意儿就冒充原来的珍品留存在世上。靠着珍品残存部分的不完全的光辉，已经照亮了整部文学史，惊动了愈来愈多的人前来瞻仰、流连、惊叹、研究，终于形成了一种专门学问。

曹雪芹的《石头记》一诞生就这样遭到了阉割、篡改和蹂躏，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费解的谜，一桩可怕的奇迹，一场永远令人痛心的悲剧。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全璧”的背后》^①一文中揭示了这场悲剧的内幕——政治扼杀了文学。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中竟有这样可耻的因袭！

程伟元、高鹗续书本的《红楼梦》有意识地篡改了曹雪芹的原意，从思想倾向到人物形象，从主题到细节，都遭到了他们惊人的歪曲。可是，因为他们伪续的后四十回书附骥于曹雪芹的前八十回，两百年来却一直迷惑、愚弄着读者。

红学的研究走过了漫长的、曲折的道路。只是到了“五四”运动以后，红学研究才开始迈上了科学的台阶。后来，又由于一种政治上的原因，红学研究遭到了可悲的挫折，越来越走上了空中楼阁式的治学道路（研究曹雪芹家世材料、《红楼梦》版本者除外，研究对象本身使他们不得不脚踏实地）。连《石头记》全璧的真面目尚没有起码的认识，却在那里大谈主题思想、人物分析……没有人敢再进行科学的探佚考证研究，据说那是一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是“烦琐的考据学”。同时，真正废话连篇的“评红”文章却到处泛滥，从来也没有人正视过。

^① 《红楼梦“全璧”的背后》，见《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辑、1981年第1辑。

历史走了一段可笑的弯路，终于不得不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要探讨《石头记》这部伟大作品的主题思想，要分析其中的人物形象，要认识它的艺术价值，首先必须弄清楚曹雪芹原来创作的《石头记》全璧是什么样子，因此必须做各种考证和探佚工作，这难道不是很普通很简单的道理吗？既然有关曹雪芹本人情况的其他材料那么少，最可靠的就是曹雪芹的作品前八十回《石头记》以及他的亲友脂砚斋等人在这本书上作的批语（大多数脂批是写于曹雪芹生前及死后不久，得到了曹雪芹基本的肯定），那么依据这些进行《石头记》的探佚研究，难道不是最唯物、最面对现实的态度吗？因为在红学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些荒谬的事情，所以不得不首先为研究方法进行辩护。

我读《石头记》，是从一个普通读者“看小说”开始的，读的当然是通行本即真假合璧的程高本《红楼梦》。但从一开始，我就有了一种强烈的印象，即这本书后头的部分不仅远没有前面精彩动人，而且总觉得有点“不对味儿”。使我从“看小说”向前进了一大步的红学研究著作是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以及俞的其他红学文章）。虽然当我接触到这本书的时候，它已经只具有“反面材料”的地位，可是当我用良心和理智的天平进行了衡量之后，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自有其一定的价值。虽然它有一些立论并不正确，但那本是研究工作进程中难以避免的，何况这种研究工作还正处于草创阶段。对其中失误的批评、不同意见的争鸣本来无可厚非，可惜一开始就是“运动”而非争鸣。俞先生的著作以通俗的语言引导读者用“研究的眼光”来阅读《石头记》，我从此才知道了有《石头记》与《红楼梦》的区别，知道了《石头记》有那样细密周详前后照应的写作方法，而开始从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来阅读《石头记》。

另一本对我有影响的红学著作是蒋和森先生的《红楼梦论稿》。它富有激情和诗意的笔触感染和打动了，它对人物形象的某些独到的分析促使我思考。虽然现在看来，它的一些立论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主要是没有从《石头记》全璧的角度立论），但在当年它确曾激发了我与命运抗争的勇气。

使我对《石头记》全璧有了进一步认识，在我心灵深处播下了“研究”种子的却是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它也许是自有红学以来贡献最大的一本书。周先生著作中许多富有启示性的论点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助益。逐渐地，在我的潜意识里萌发起“研究”、“探佚”的幼芽。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年我不得不与命运进行搏斗，我身边又只有一套程高本《红楼梦》，并没有脂批本《石头记》，所以我一直只是一个《红楼梦》的爱好者，从未想过自己去进行“红学”研究。

记得有一次我读到《红楼梦》第六十三回中探春抽了一支杏花签，“注云：

得此签者必得贵婿……众人笑道：‘……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我当时就产生了一种想法，探春后来可能真地做了王妃吧。我把《红楼梦》前后翻了翻，想找一些其他的证据，但在程高本《红楼梦》中却什么也找不到。我也就把这种想法丢到脑后了，一晃上十年。

1978年9月我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研究古典文学，也并没有想研究《红楼梦》，由于忙着阅读其他书籍，《红楼梦》连碰一碰也没有时间了。我先研究《庄子》，后又研究清初戏曲家李玉，从未想涉足红学。我当时也受一种普遍舆论的影响：红学不好搞，因为搞它的人太多了。只是由于过去对《红楼梦》的兴趣，所以也常翻翻报纸杂志，看看红学研究的发展动态。直到1980年暑假，我偶然又想起了探春是否做了王妃的问题，到图书馆翻了一下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却发现了被程高本删去的探春放凤凰风筝的一段文字，这触动了我的研究红学的兴趣，经过几天努力，写出了第一篇探佚文章《探春的结局——海外王妃》^①。

文章写成后立刻得到了导师姚奠中先生的赞许，又得到赵景瑜先生的支持，当时赵先生正要去哈尔滨参加全国《红楼梦》讨论会，他向我提出把这篇文章带到红学会议上请专家鉴定一下，后来在会议上经蔡义江先生看过，给予了鼓励。我接着写了第二篇探佚文章《史湘云嫁贾宝玉说》，寄给了周汝昌先生。由于地址不明，邮局错投，往返两个月，投寄两次，周先生才收到了这篇拙稿。周先生收到拙稿后，没过几天就给我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予很大的支持和鼓舞。在周先生的鼓励下，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半年的时间里，陆续写下了20篇探佚文章^②，成了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这就是这本《石头记探佚》的缘起和经过。

第四本对我有影响的红学著作是蔡义江先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这本书里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我进行探佚研究时，确实从它获益不小。

在浩瀚的红学大海边，我拾了几个贝壳和石子，实在还不能说已经涉足红学。我只对《石头记》本身感兴趣，对于曹雪芹的家世材料的考证、《红楼梦》版本的研究等则只限于利用红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自己并没有研讨的兴致。我这本肤浅的东西中，贻笑大方之处在所不免，但我不怕由于浅薄无知而丢脸，因为我本来就是浅薄无知的。我只是老老实实说出自己读《石头记》的心得和

① 《探春的结局——海外王妃》，载香港《抖擞》学刊，1981（1）。

② 序言写成后，又补写《尤三姐的厄运》、《“抄没贾府”考》、《“情榜”证情》、《话说柳湘莲》四篇。

体会，至于它们是否正确，则留待客观与时间的检验了。还是那句老话“村老是信口开合，情哥哥偏寻根究底”，我乐于向真理低头，也要为维护真理而坚持。

我谨向所有给予我指导和鼓励的师长、同志们，向山西人民出版社^①表示深切的感谢。周汝昌先生一开始就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以病残之目、百忙之身阅读了十余万字的拙稿，并写了序言；姚莫中先生也阅读了全部拙稿并写了序言，尤是我永远铭记的。

集中篇目独立成篇，故不免有内容重复之处，为行文和阅读之便，只得任之。篇目的排列顺序基本上按写作的时间先后而略加调整，也是考虑到阅读方便。

最后，录不久前所作《题石头记探佚》，作为这篇序文的结束：

花魂鹤影湘妃梦，出入空门自证情。
血染香襟弓马事，泥污美玉兵车行。
绿林铤起鸳鸯剑，沧海飘零鸢风筝。
顽石有知长抱恨，大荒山下望双星。

1981年4月19日

于山西大学

^① 出旧版《石头记探佚》之山西人民出版社文教组，本书新版时已独立为山西教育出版社。

《石头记探佚》新版前言

“果然万物生光辉”——这是“文采精华”的贾府三姑娘探春的一句诗，正好借来譬喻 20 世纪 80 年代蓬勃兴起的“探佚学”，对《红楼梦》研究一新其面目的历史性贡献。

《石头记探佚》撰于 1980 年，是红学史上“第一部探佚学专著”。周汝昌 1981 年为之作序，首次揭出“探佚学”这一名目。《探佚》“问世传奇”后，倏忽已十年。这期间各方面的反应可谓众说纷纭，毁誉不一，但那总的趋势，还是“渐入佳境”的。1983 年、1985 年、1991 年三次印刷，总印数达四万六千册。在红学研究著作中，如果不算“诗词评注”之类，这印数还是可以争一争“排行榜”的。“探佚”对“红迷”们产生的魅力，也就可以仿佛想见了。

继《探佚》之后，笔者又撰写了《被迷失的世界——红楼梦佚话》一书和一组可总目为“梦在真假之间”的系列论文。《佚话》综合评述海内外各家探佚之说，其实是《探佚》的补充，1987 年出版，也印了两万四千余册。两书联手，已经是七万“子弟兵”在为“探佚学”打天下闯世界了。20 篇左右的论文则是把“探佚”向“形而上”层次提拔的努力，以单篇的形式发表于各种刊物，也曾有一番振聋发聩的气势。由基础的探佚考辨，到美学、文艺理论和文化多种角度、层面的阐发，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不仅探佚的足迹斑斑可见，而且也自一个侧面映照出中国思想文化十年来的变迁历程。真理是朴素的，故大家所见略同。《美学史上的一幕悲剧》写于 1982 年年初，当时“中华汉文化是伦理本位，传统中诸多痼弊皆可由此寻根”这一“常识”尚未如此明确，本文所论析的问题却已暗合这一“微言大义”。《“空灵”与“结实”的奇观》、《从“薄命司”到“情榜”》成文之时也还不能读到“儒道互补”、“庄子抗拒异化”等高明论述，而其“道理”也已在两文中“暗渡陈仓”。从“悲剧观”到“典型”、“类型”之辨，从“美学系统”到“接受美学”、“文化比较”之说，不是故意“赶潮流”，实在是时代思潮的哺育牵扯着几许天机。作探佚研究，如果不能由细目考辨进一步作宏观鸟瞰，那一定会入迷楼而莫知出入，

绎“戈尔迪之结”而不得纲领，徒然眩惑于其不成片段之七宝楼台，绝难更入万象在旁，掉臂独行之境。因此，当《石头记探佚》出新版之际，不但原有的考辨补充了11篇新文，而且加入了一组思辨文章，分全书为“考论编”和“思理编”两部分。比起旧版来，新版大约增加了近两倍的篇幅，在思悟境界上也翻出了一个齐天大圣式的筋斗。以“书格”论，确确实实是身价不同，今非昔比了。

探佚与红学革命之来龙去脉，可先用“扫描式”，作尝鼎一脔的概说。

一 探佚版本论

探佚的初始研究，本来是从《石头记》版本研究所生发的。“新红学”发现了脂批本系统的抄本《石头记》，有一部分批语逗漏八十回后佚稿情节与通行的程高本《红楼梦》迥然不同，引发了探讨原著佚稿真貌的兴趣，探佚于是滥觞。但五六十年来，探佚的实绩十分薄弱，故而“两种《红楼梦》”的观念并未深入人心，红学界评红，作思想艺术分析，大多数只有“一种《红楼梦》”的观念，仍然是程高本《红楼梦》为唯一“整体”的独霸天下。探佚学兴起，挟霹雳之势，对这种“独霸”作出挑战，锋芒所向披靡，使红坛稍有识见者，无论尊高尊曹，把笔为文之际，都严格区分“两种《红楼梦》”。最有趣的例子，是对高鹗续书崇拜到五体投地的张国光教授，所撰鸿文的标目却是《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论应充分评价高鹗续改红楼梦的贡献》。时代演进之迹，如此彰明较著，回头看昔日的评红书文，俯仰之间，俱成陈迹，几乎谈不到什么学术价值了。

二 探佚与自传说

新红学中的自传说，是数十年来红坛一大公案。20世纪50~70年代，“自传说”几乎就是“反动”的同义语。即使在“思想解放”之后，为自传说翻案也难以跳出“生活原型”和“艺术加工”的范围，不能鞭辟入里。等到探佚学风行之后，曹雪芹原著《红楼梦》“全璧”显示出一个空前伟大的心灵，才逐渐为人所知，水到渠成，对自传说的认识也升堂入室了。最显著的如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以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为自传说“翻案”，其立论角度、文思境界与《红楼梦新证》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究其底里，实在与探佚研究的深入进展颇有关系。罗钢、陈庄合撰之《伟大心灵的艺术投影》（刊于1987年第2辑《红楼梦学刊》），借助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指出自传体小说是个性主义近代思潮的产物，《红楼梦》的“自传”性质是曹雪芹“伟大心灵

的艺术投影”，正是一种划时代的进步。其实，由探佚证成之“两种《红楼梦》”的事实，最能予此说以实证支持并加以深化。

三 探佚结构论

曹雪芹原著《红楼梦》全璧具有一巧夺天工的整体大结构，而高鹗续书则把这一结构之美免破坏无遗，探佚学行世使真相大白于天下。《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专辟“结构学”一章，揭示出《红楼梦》的结构与探佚，与中华文化的传统之内在联系。其他如原著“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这一基本结构方法，虽然脂批屡次示出，而在探佚学未行之时，红学专家们大多熟视无睹，全不具眼，迨探佚学出才使他们由“麻木不仁”而“恍然大悟”。至于“前五回为总纲”、“两条主线”、“盛衰对称的大章法”等结构论旧说，无不因探佚的大成而愈明愈显，乃是不移的事实。

四 探佚悲剧观

当程高本《红楼梦》“独霸”之日，“黛玉钗嫁”“调包计”的“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不知赚了多少人的眼泪。这一“杰出伟大之悲剧”被目为《红楼梦》的“最高潮”。探佚学出，才揭示曹雪芹原著之“爱情悲剧”另具面目，其真伟大、真杰出超越“调包计”之悲剧不知凡几。要而言之，曹著悲剧达到了哲理层次，高著悲剧则停留在伦理水平；“眼泪还债”为自我牺牲之“伟大人物的灭亡”，“钗、黛争婚”则二女争夫之伦俗卑琐的闹剧，二者境界，真如霄壤。寻根问源，这两种不同的悲剧观更透露出国民性之优劣，民族文化心理之纠葛。

五 探佚人物论

探佚研究的发展革新了《红楼梦》人物的论析。在先，只知贬责花袭人的“无义”、薛宝钗的“虚伪”，揭露王熙凤的“狠毒”、贾母的“凉薄”，歌颂尤三姐的“刚烈”、晴雯的“反抗”，褒扬林黛玉的“觉醒”、贾宝玉的“叛逆”。偶然有一二论著能突破这种批评模式，如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也终因不能从原著“全璧”着眼而无法更上层楼，“突破”毕竟受到局限。由探佚而窥全豹，才知红楼人物原是“圆”的典型，大别于后四十回续书“扁”的类型。“钗、黛合一”本“儒道互补”，贾宝玉“情不情”类释迦、基督。《红楼梦》人物论借探佚之阶梯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